



从“轻难坝”到“金兰坝”

——一个巴渝地名的嬗变与乡土中国的文化密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曾庆福

在中华历史长卷中，地名并非静止不变的符号，而是承载着岁月流转、族群迁徙、生产活动与文化想象的活态记忆。它们的演变，暗藏着社会变迁与集体心理的深刻逻辑。

位于重庆万盛经开区的金兰坝，其名从南宋轻难坝到今日金兰坝的跨越，便是一幅微缩而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文化演变图景。通过对这一地名嬗变的抽丝剥茧，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真相、民间传说与美好寓意如何交织缠绕，共同塑造一方水土的身份认同。

一 历史的本相

“轻难”其名与地理实况

地名的起点，往往扎根于最质朴的地理特征或生存体验。金兰坝的最早文字记载，见于一方出土的南宋墓志。据《赵牟氏墓志铭》载，乾道元年（1165年），赵牟氏之子将其母迁葬于“轻难坝山下”。此碑文于清嘉庆年间因雨水冲刷墓穴而重现人世，被学者罗星收录于道光版《綦江县志》，可靠性极高。

“轻难”二字，为我们揭示了这片土地最初的面貌与先民的感受。“轻”字，在此处非指重量，而在古汉语中有轻视、不

为重的引申义，亦可通“经”，有经历之意；而“难”字，直指艰难、险阻。结合金兰坝的地理环境——虽为坝子，但四面环山，交通闭塞，在古代开发初期，必然面临垦殖艰辛、出入不便等现实困难。“轻难”一名，极可能是一种略带诙谐或无奈的口语化表述，形容此地是“看似寻常（或须经历）的艰难之地”，真实记录了先民拓荒时的生存境遇。

二 音转的桥梁

“轻难”的流变与地名记忆

在缺乏严格标准化字形的民间社会，地名在口耳相传中发生音转，是普遍且自然的现象。清代綦江大儒罗星在考察后明确指出：“所云轻难坝，今讹为金兰坝。”“讹”字点明了这一变化的关键机制：音近而转。

“轻难”到“金兰”的音变轨迹清晰可循。在当地方言中，两者发音可能高度近似。这种音转为后来的雅化与再解释提供了语音基础。晚清秀才戴鼎喆在《培修寡妇堰记》中提供了更多线索：“此地旧名‘轻滩’……而永兴诸堰乃作‘金釜’，或作‘轻楠’。”“轻滩”可能是对“轻难”因地形（养生河的溪滩）产生的另一联想性记录；而“金釜”则是更具戏剧性的音转，令人联想到皇家宫殿，虽显附会，却反映了民间对富贵荣华的向往；“轻楠”则可能结合了本地植物（楠木）的联想。这些散见于坟墓、桥亭碑碣上的异写，如同一面面棱镜，折射出地名在民间流传中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。它们并非“失考”的谬误，而是地名活态演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“复数历史”，共同构成了地名记忆的民间档案。

三 传说的附会

结义故事与移民历史的糅合

当地名完成从“轻难”到“金兰”的音转后，“金兰”二字所具有的深厚文化意象（源自《周易·系辞》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”及《世说新语》中的“金兰之好”），必然激发民间进行故事性阐释的冲动。于是，一系列附会传说应运而生，试图为这个美好的新名找到历史的“根源”。

一种传说将“金兰”与当地盛产的金兰花相联系，并衍生出早期张、戴二姓因花结谊、和睦如兄弟的故事。然而，族谱史料揭示了更复杂的移民真相：戴姓于明代洪武年间徙居此地，而张、霍二姓则主要是在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的移民浪潮中迁入。时间上的错位，使得“效法桃园三结义”的叙事（如金兰坝入口现代牌坊简介）更像是一种对理想社区关系的追认与建构，而非历史事实的记载。更具现实色彩的是，戴鼎喆提及明代秦姓寡妇修筑水堰的功德，并推测“金兰”之名或源自其家族所用《金兰簿》（记载结友名录的册子）的遗意。此说将地名与地方开发史上真实的重要人物联系起来，尽管仍需实证，但比单纯的结义故事更具历史纵深感 and 地方特色。

这些传说，无论虚实，其文化功能在于：它们用生动的叙事“填补”了音转留下的意义空白，将原本可能指向艰难地理的旧名，成功赋予了文化内涵，满足了社区凝聚与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。

四 雅化的定名

文人润色与官方认同的塑造

地名从民间俗称上升为官方正式

名称，往往离不开地方文人的考证、润色与官方的采纳、标准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价值评判与美好愿望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。

罗星作为本土儒学精英，在记录时虽指出“金兰”为“轻难”之讹，但他同时将此地誉为“小桃源”。这一文学化的比喻，彻底扭转了“轻难”所隐含的负面意象，转而强调其四面环山、良田百顷、流水淙淙的富庶与幽美，为地名的雅化奠定了审美基础。当“金兰”这一名称因其吉祥、文雅的寓意（金兰之交）与地方文人及民众对和谐、繁荣社区的期许高度契合时，它便从众多音转异写中脱颖而出。

最终，金兰坝取代轻难坝及其他名称，被地方志、官府文书及地图所固定下来。这一选择，并非对历史原名的简单恢复，而是一次积极的、具有文化建构意义的“正名”。它选择的是一个寄托了人际关系理想（和睦如金兰）与地方发展愿景（稳固而芬芳）的美好词汇，从而完成了地名从“记录地理实况”到“承载社会理想”的功能升华。

金兰坝的命名史，是一场跨越八百余年的无声对话。它始于南宋移民对“轻难”之地的客观描述，历经民间口传中自然而随性的音转（金釜、轻楠等），再通过附会传说进行意义的重构与填充（结义故事、金兰花、金兰簿），最终在文人雅士的审美提升与官方标准化中，定格为寓意美好的“金兰”。这一过程，生动诠释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地名演变的经典模式：它是一条从历史事实出发，经由语言流变、民间记忆编织，最终抵达文化理想彼岸的路径。

方寸间的变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在我的书架上，放着三层近百盒“索尼”录像带。录像带上都标注着拍摄时间、地点和内容，这是我多年以前用摄像机，记录着家乡江津古城变迁的历史资料。

回望过去，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……我结束了知青生涯，返回城市，进入了一家单位工作，生活平淡无奇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我下海成为江津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之一。

我从经营服装、皮鞋、皮衣的店铺，到办雨伞加工厂，再到开茶馆、酒楼、宾馆，成为早期步入小康生活的一员。于是，我在滨江公园旁买了一套江景房，临水而居。然而，我深知物质层面的富足不算完美，人还应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。

有人建议我成立公司，但我自认为做个体户更自在。此时，正是百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，我开始尝试电视摄像服务。这行业，既时尚又有品位，且不易被人追赶。我立刻在江津县城创办了首家电视摄像服务部，为生日、婚礼、企业庆典等活动提供有偿服务。

社会在进步，城市在发展。1989年，江津滨江路防洪大堤试验段开工，场面感人。我用镜头记录下上千名民工日夜加班修筑防洪大坝，改变江边景观的场景；记录下周末，机关单位人员、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共同奋斗在筑坝一线；不少市民排队为工程捐钱捐物，场

面感人。

这年的酷暑之夜，洪水袭来，眼看大水即将漫过正在修建的江堤，工程指挥部的党员干部和民工突击队员，立即冲上抗洪一线，转移机械设备、水泥材料，抢修大堤，终于使江堤转危为安。

那一夜，我奔波忙碌，不断抓拍，摄像机的电池也换了两块。

我想，这些感人的画面能够通过江津电视台宣传出去，那该多好啊！我跑到电视台，向编辑老师请教，他看了我拍摄的视频资料后，给予了肯定与赞赏。从此，我成为江津电视台的通讯员。

电视摄像需要技术，写作新闻稿需要文化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。在虚心学习的过程中，我迅速掌握了摄像的技能，以及电视画面处理的诸多技巧。新闻写作并非一日之功，我放弃了喝酒、打牌、唱歌等个人爱好，夜晚闭门，埋头苦读，补充知识。

为了尽快上手，我将部分生意交给了妻子打理。

白天，我肩扛摄像机，身挎照相机，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，记录着文庙、魁星楼、遗爱池、民工纪念馆、四合院、旧城改造、110出警、百姓的“菜篮子”等场景，我用心抓拍社会新闻和时代变迁，忙碌而充实。

回想当年，正如那句俗语：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我肩扛M9000摄像机，胸前挂着工作证，用镜头记录下江津撤县设市建

区、长江大桥落成、聂帅纪念馆揭幕等重大事件。

1992年秋，江津撤县设市那天，万人空巷，欢声雷动。作为特邀通讯员，我胸前吊着工作证，肩扛摄像机，登上遗爱池城楼，记录下了盛大的庆典活动。

1997年，政府引资修建了第一座江津长江公路大桥，通车庆典的那天起，“走遍天下路，难过江津渡”的历史成为过去。我的镜头里记录下了庆典的全过程。庆典结束时，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枚“江津长江大桥竣工”纪念封，邀请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、市领导以及马来西亚投资代表为纪念封签名。为此，我在《重庆集邮报》上发表了《我为江津长江大桥制邮品》的文章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边经商，一边从事电视摄像和新闻写作。我送播的电视新闻、电视专题片以及其他新闻在各级媒体上发表，由于发表的新闻多，获得了重庆市委宣传部连续三年授予的“优秀新闻工作者”称号。

在镜头的方寸之间，我用心捕捉，记录下了江津千年古城的历史变迁、新旧交替，以及完成了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新闻报道，因而成为《重庆市精神文明个

体户》。我也先后成为重庆市新闻、摄影学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江津区第五届作协副主席。我这位个体工商户，从摄影摄像发展到文学创作，这角色转换，不仅是个人的努力，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的缩影。

几十年一晃而过，江津，这个长江要津，正从历史深处走来，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。

而今，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我继续精彩着，我用智能手机，用AI改变生活、传播快乐。是的，生活中那么多快乐，哪能自己独享呢！